



21-26

從古典到現代——北歐漢學研究的轉向與拓展

From Classical to Modern:
Changing Directions and Developments in Northern European Sinology

李明 (Li Ming) *

一、引言

有著悠久歷史的北歐漢學，自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以來，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幾個方面：一、研究內容從傳統古典轉向現代和當代；二、研究範圍從單一轉向多元，即從側重語言學、考古學、古代思想研究向文學、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等各領域的擴展；三、研究方法從對中國的「純文本」、「博物館」式的研究到與當代中國學者進行學術探討和直接對話的轉變。

北歐漢學的這種現代轉向與整個西方漢學的轉向有其共同的特點，但也有一些由於自身原因而形成的獨特之處。

二、傳統的北歐漢學研究回溯

早在西元 8 世紀，北歐人就知道絲綢之路。在瑞典梅拉湖 (Mälaren) 的一個小島上，人們發現了中國唐代絲織品的殘片。在芬蘭的土爾庫大教堂裏，存有一個中國元朝時 (西元 12 世紀) 的綢布袋。¹

但比起一些其他歐洲國家來，北歐人與中國的直接接觸，則要晚得多。與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

等國家不同，北歐國家在中國沿海地區沒有殖民地，因此，刺激北歐人漂洋過海到遙遠的中國來的動機也不一樣。² 一般說來，最早到達中國沿海地區或中國本土的北歐人，大致是兩種人：第一種是科學家、旅行家兼探險家，第二種是傳教士。第一種人最早是隨成立於 1731 年的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船到中國來的。他們當中有的是瑞典人，有的來自獨立前的芬蘭和其他北歐國家。其中植物學家卡爾·林奈 (Carl von Linnæus, 1707-1778) 的一些門生們也曾隨船到過中國，他們在船上擔任很重要的職務，有的甚至親自擔任船長，如：卡爾·古斯塔夫·艾克貝 (Carl Gustaf Ekeberg) 等，這些人後來都發表過一系列有關中國的科學考察報告及在中國的見聞。到了本世紀初，出現了兩位著名人物，一位是斯文·赫定 (Sven Hedin, 1865-1952)，他分別對中國的帕米爾、塔克拉瑪干、塔里木盆地、羅布泊以及藏北地區進行了考察；另一位是約翰·古納·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他參與了北京郊外周口店遺址的發掘，還在河南省仰韶村附近找到一處遺址，發掘出大量的石器和彩陶。³ 第二種人相對來說，不那麼知名，其中比較有名的是韓山文 (Theodor Hamberg)，他曾給洪秀全的族弟，對後期太平天國運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洪仁玕講授過基督教義，還著有《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書，以此完

*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1 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關於瑞典漢學史〉(O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Sinology)，《歐洲研究中國》(Europe Studies China)，頁 161。

2 例如荷蘭，早期漢學的起源與為國家培養殖民地的翻譯人員有密切的關係，參見《國際漢學》第 3 輯〈引水者與拓荒者〉一文。

3 參見羅多弼 (Torbjörn Lodén)，〈面向新世紀的瑞典中國研究〉，由本文作者譯成中文，載《國際漢學》第 4 輯，頁 397-428。

成了對中國和對北歐的雙向影響（他的這本書用英文發表，在北歐以至整個西方都擁有廣泛的讀者）。漢學教授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認為，「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在瑞典早期的中國研究史上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⁴ 另一位傳教士愛立克·福克（Erik Folke, 1862-1939）曾於 1887 年至 1920 年間多次來中國傳教，並把《莊子》與《老子》譯為瑞典語，還出版了一本《古代中國的思想家》的著作。（在把中國的文化及思想傳到北歐各國的過程中，傳教士們無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一課題尚待深入研究。）

儘管北歐國家的知識界很早就有人對中國產生興趣，並且從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初，瑞典的烏普撒拉大學就已出現了三篇以中國為研究題材的博士論文，即《長城簡述》（*Murus Sinensis brevi dissertatione adumbratus*）（1694）、《論中華大帝國》（*Demagno Sinarum imperio*）（1697）、《略論中國哲學家孔子》（*Exercitium academicum Confucium Sinarum Philosophum leviter adumbrans*）（1710）。但是，嚴格意義上的、作為一門學術性學科的漢學，即大學開設漢語課程，設立教授席位並專門從事對中國語言、文字和文獻的研究，則是 20 世紀初才開始的。當時，學生們在課堂上學的是古代漢語，閱讀的也是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在瑞典，大學漢學研究課程的設立是從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開始的。高本漢在 1915 年完成了《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的第一部分，並以此獲得了博士學位後，於 1918 起在哥德堡大學講授東方語言和文化課程。⁵ 1939 年起高本漢任遠東博物館館長並同時執教於斯德哥爾摩大學。他除了對中古和上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擬定外，還翻譯或注釋了《詩經》、《書經》、《左傳》、《老子》等許多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發表了許多論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重要文章。1965 年，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接替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教授職

位，他最初也是一位繼承高氏傳統的古典漢學家。

丹麥的情況與瑞典多少有些類似。從 1921 年起，一位名叫夏雷（Sia Lei）的中國駐丹麥公使館館員在哥本哈根大學教過一段時間中文，後來夏雷的學生柯特·沃爾夫（Kurt Wulff）從 1928 年起繼續這門課程，直到他 1938 年去世。他所講的課程主要是帶領學生讀《左傳》、《史記》、《禮記》和《孟子》等著作。在他去世後，丹麥的漢語教學中斷了，直到 1957 年，由高本漢的學生易家樂（Søren Egerod）將這門課程恢復並於 1960 年創立了哥本哈根東亞學院。易家樂的研究領域是古代漢語、漢語言文學和東南亞語言，同時他對中國哲學和宗教也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⁶

挪威的漢語教育和研究是由一位名叫富南（Adolf Mauritz Fonahn）的人開始的。他是一位醫學史研究者，在對中國古醫書的興趣引導下開始學習漢語，並自 20 世紀 20 年代起，曾在奧斯陸大學教授過古漢語課程，並編有一本英漢詞典。在他之後，高本漢的學生翰漢樂（Henry Henne）自 1952 年起，在奧斯陸大學教授中文，並於 1965 年成為這個學校的東亞語言和文學教授。正像高本漢的其他學生一樣，他最早關注的仍是傳統的語言和文化教學。⁷

芬蘭的情況略有不同，這個國家的東方研究在傳統上把注意力放在近東和北亞。只是到了 20 世紀的 80 年代，該國才出現兩部研究中國的博士論文，一篇是研究《論語》，另一篇研究章太炎。該國漢學研究的現代轉向，也明顯晚於其他北歐國家。⁸

三、北歐漢學研究從古典到現代轉向的契機

如前所述，在北歐漢學的建立方面，高本漢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不僅由於他自己在音韻學領域具有開

4 同註 3，頁 403。

5 見馬悅然，《高本漢——一位學者的畫像》（Göran Malmqvist, Bernhard Karlgren—Ett Forskarporträtt. Stockholm: Norstedts, 1995），頁 182。

6 Søren Egerod, "Chinese at Danish universities,"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歐洲漢學協會通訊》) 1994.3: 5-9; Kjeld Erik Brødsgaard, "State of the Field: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Scandinavia," *The China Quarterly* (《中國季刊》) 1996.9: 943。

7 Harald Beckman, "A Historical Sketch of Sinology in Norway,"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1994.3: 57-60。

8 Kauko Laitin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Finland,"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1994.3: 45-46。

拓性的研究，而且還因為他培養了整整一代學生，正是這些學生後來對北歐漢學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儘管高本漢也寫過一些關於現代中國歷史的普及性著作和漢語簡易讀本，但他的主要學術貢獻卻是古典研究，這是歐洲漢學的傳統。他的學生們開始都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們所建立的一些學院也以歷史語音學、古代宗教、哲學和語言學等研究為本。

北歐社會對現代中國的關注，最早是從漢學圈以外開始的。參加這種研究的人是一個由經濟學家、政治學家、記者和知識份子組成，常具有左翼傾向的特別團體。⁹ 有兩個原因促成了北歐國家知識份子對現代中國的關注。

第一，北歐各國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批西方國家，從 20 世紀 50 年代起，就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因此，這些國家與中國大陸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些國家中許多人對努力克服舊社會的腐敗現象，致力於人的平等的新中國有著良好的感情，熱情關注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同時，北歐一些國家的人民對美國在越南的政策表示反感。當時的瑞典首相帕爾梅甚至公開抨擊美國的越南政策。¹⁰ 在這種背景下，北歐的知識份子深受中國一些英語出版物，例如《英語週報》等雜誌的影響。國際政治態度的不同，再加上所依靠的材料的不同，使得北歐學者的中國研究成果與英美學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色彩和政治傾向。

第二，在這些國家中，社會民主主義深入人心，人民原本就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由於他們接觸的材料限制，使得許多人從理想的一面看待中國 20 年代的一些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並把這種革命與當時西方，特別是法國的社會造反運動聯繫起來。這樣，就將一個今天被我們中國人稱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塗上了浪漫的色彩。從今天的觀點看，這當然是不對的，北歐的漢學家們也經常反省這個問題。但是，

正像 18 世紀的歐洲人通過把中國理想化而形成了一個時期的中國熱一樣，左翼運動在將年輕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當代中國文化和社會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羅多弼教授就曾經指出，「讓·米代爾（Jan Myrdal）和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這樣一些作家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使他們的興趣轉到了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研究上來」。¹¹ 事實上，在 70 年代的北歐國家，這些左翼作家們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書對公眾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多更具學術性的著作都難以達到的。數以百計的學生也正是從那時起開始學習漢語的。

在社會上對當代中國的介紹和研究形成一種潮流的時候，大學的漢學系一度仍取保守的態度。當時在漢學家們心目中，研究古代中國才是學術，是漢學應該做的事。正如丹麥漢學家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教授所指出的，「絕大多數漢學家都注重研究諸如歷史語音學，古代宗教、哲學和語言學等傳統漢學，而有關當代中國的研究則被視為一種淺易的工作，由記者和外交家們去做就足夠了」。¹²

然而，時代潮流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學生，特別是在左翼思想影響下的青年學生，加入到漢學研究的圈子中來。學生們的要求，迫使漢學研究系的研究和教學都開始發生一些變化。例如，在回答為什麼轉向對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時，瑞典的馬悅然教授就曾說，這是被學生逼出來的。

北歐學生學習漢語的一些特定的情況，也對他們向現代轉向起了推動作用。由於北歐國家承認新中國早，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外交關係，因此北歐的學生很早就到中國大陸學習，這是其他西歐和北美的國家所沒有的便利條件。另外，在這些北歐國家中，瑞典有一個很好的政策。瑞典外交部從 60 年代起開始雇用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擔任瑞典駐華大使館的文化專員，這就使這個國家的漢學圈獲得了一個在中國的基地。這些文化專

9 這個時期的重要著作有，Kjeld Allan Larsen, Kai Bundgaard Madsen, Ida Munk Nielsen 和 Knud Erik Skouby, *Kina et land in socialistisk udvikling* (《中國：一個社會主義在發展的國家》) (København: Akademisk Forlag, 1973); Göran Leijonhufvud, *Mao Zedong och den ständiga revolutionen* (《毛澤東與不斷革命》) (Stockholm: Aldus, 1975); Bjørn Hettne, *Utvæklingsstrategier i Kina ock Indien* (《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策略》) (Studentlitteratur, 1971); Preben Sørensen, *Vejen til Forkekommunen* (《通向人民公社之路》) (Kongerslev: GMT, 1975)。

10 Jörgen Weibull, *Swedish History in Outline*, (Svenska Institutet, 1997), p. 136.

11 羅多弼，〈面向新世紀的瑞典中國研究〉，《國際漢學》第 4 輯，頁 421。

12 Kjeld Erik Brødsgaard, "State of the Field: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Scandinavi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6.9: 938.

員畢業於大學的漢學系，與大學的漢學研究圈有著天然的密切關係，可以在人事接觸、文化活動安排、圖書資料採購等諸多方面為瑞典的漢學界做許多實事。同時，也使這些作為文化專員的漢學家本人能夠在任職期間與中國同行們進行廣泛接觸，建立友誼，為以後的學術交流打下基礎。¹³ 這些人到中國學習和工作，說現代漢語，讀中國報紙，與各階層的中國人接觸，置身於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之中，對於漢學家們改變過去那種僅僅從古代文本上研究中國的傾向，無疑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當新一代漢學家成長起來時，北歐漢學向現代中國研究的轉向，就變得不可逆轉了。

四、北歐各國漢學研究現代轉向的特點

由於北歐各國的漢學研究傳統不同，這些國家漢學的現代轉向，也呈現出一些不同的情況。一般說來，瑞典的漢學，由於馬悅然的影響，更重視中國文學、歷史和文化，這一特色一直保持到今天，而丹麥則更重視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等一類的問題。

接替高本漢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職位的馬悅然，早年接受過良好的古漢語和音位分析的訓練，做過四川方言研究，對《公羊傳》、《穀梁傳》和《春秋繁露》進行過細緻的文本分析。後來，他的興趣和注意力就轉到用英語和瑞典語向世界介紹和翻譯中國的文學作品上來。他的翻譯工作既包括古代中國小說和詩歌，也包括現、當代中國文學作品。在古典文學方面，他翻譯過唐詩、《水滸傳》和《西遊記》等，而在現代文學方面，他翻譯過沈從文、李銳等一些人的小說，北島等現代詩人的詩歌，還譯過一本由毛澤東的 38 首詩構成的詩集。馬悅然以他優美的文筆，擴大了中國文學在瑞典的影響。作為這種影響的一個例子，瑞典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旅遊項目，稱之為「沿著沈從文的道路」，許多退休的瑞典老人，手持著馬悅然翻譯的《邊城》，到中國湘西去尋找書上所描寫過的地方。

作為這種現代轉向的一個標誌，1975 年，由馬悅然編輯，瑞典諾貝爾基金會資助出版了「諾貝爾論叢第 32 種」《近代中國文學與社會》專題論文集（Nobel Symposium No. 32.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Stockholm, 1975），主要編選了北歐各國漢學家對現當代文學的學術論文，涉及的課題非常廣泛，如《中國二、三十年代翻譯文學中的英國作家》、《論朱光潛美學理論的社會關聯》、《易卜生的勞娜和中國婦女的解放》、《浩然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論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中的社會與文學之內容》等。

馬悅然的學生中有許多人的論文也從現當代中國文學選題。目前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羅多弼和擔任隆德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羅斯（Lars Ragvald），當年的博士論文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有關。羅多弼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普羅文學論戰」，而羅斯的博士論文討論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姚文元。兩篇論文都成書於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在中國剛剛結束「文革」之時，他們也開始了從文學角度對左翼思想的反思。

後來，這兩位馬悅然教授的高足分別向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羅多弼轉向了對現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並出版了一本關於毛澤東逝世後中國思想界變化的著作。而羅斯則轉向對現代漢語的研究，致力於編撰一部《漢瑞詞典》。

目前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執教的蓋瑪雅，則於 1990 年完成一部有關中國相聲的論文。這樣，由馬悅然完成的現代轉向，在斯德哥爾摩和隆德這兩個瑞典漢學的主要中心得到了發展。

馬悅然還有一些學生一開始就從事文學以外的現代中國課題的研究，例如，沈邁克於 1987 年完成了關於毛澤東與中國大躍進運動的論文，而雷尤倫於 1989 年完成了題為《反潮流》的關於中國「文革」時有關大字報運動的論文。而一些在漢學圈外活動的學者，也發表了一些關於現代中國研究的論文，他們當中比較突出的有政治學家郝德馨（Tom Hart）和教育學家讓·英格瓦·羅夫斯太德（Jan-Ingvar Löfstedt）。¹⁴

13 許多具有很強學術功力的漢學家，如馬悅然、羅多弼、沈邁克和閻幽馨等人，都擔任過這一職位。

14 Jan-Ingvar Löfstedt,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 Changes and Contradictions" (Stockholm, 1980) 和 Tom G. Hart, "The Dynamics of Revolution: A Cybernetic Theory of the Dynamics of Modern Social Revolution with a Study of Ideological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ockholm, 1970).

作為對傳統漢學科系的補充，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和隆德還分別設有一個與東亞地區研究有關的中心，展開對這些地區的區域研究。

與瑞典不同，丹麥的現代中國研究從一開始就關注中國的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問題。這與丹麥漢學研究的漢學轉向在體制上的特點有關。在丹麥，漢學研究的重心有兩處，一是哥本哈根，一是奧爾胡斯。

哥本哈根學術圈裏的當代中國研究，最早是在哥本哈根大學的漢學系之外，由一個名叫「東亞和東南亞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簡稱 CESEAS) 的組織承擔的。最初這是哥本哈根大學於 1981 年成立的一個單獨的工作小組，為開設一個二年制的地區研究課程作準備。然而，丹麥教育部最後還是決定將這個新的研究課程放在奧爾胡斯大學。於是，這個小組從 1984 年起就自稱為「東亞和東南亞研究中心」繼續舉行定期活動，安排討論會和學術會議。1987 年，中心的活動被置於哥本哈根大學校長辦公室的直接領導之下。直到 1994 年，這個中心實際上被取消。這個中心，依照曾擔任這個中心主任的柏思德教授的話說，「對丹麥當代中國研究所起的作用是怎麼估價也不過分的。」¹⁵ 在丹麥涉及當代中國研究的 8 篇博士論文中，有 5 篇是由與該中心有關的學者完成的。只是到了後來，哥本哈根大學的漢學系才完成現代轉向。

相比之下，奧爾胡斯大學的漢學研究的現代轉換則要自然得多，自 70 年代起，已逐漸轉到對 20 世紀中國的研究上來。現在，學院三位固定的漢學教研人員都在研究現當代中國。1981 年，學院成立了中國資訊辦公室，這是一個服務於商業團體的文獻中心，同時出版定期時事通訊《中國資訊》(*Kina Information*)。1984 年，該辦公室與奧爾胡斯大學政治學系合作，提出了一項東亞地區研究計畫。

丹麥的現代中國研究，還受益於一個北歐的地區性亞洲研究組織——總部設在哥本哈根的北歐亞洲研究院

(The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簡稱 NIAS)。這個機構創建於 1967 年，是在丹麥、芬蘭、挪威、瑞典等北歐各國政府資助下而建立起來的一個獨立的學術研究機構，該機構主要致力於支持和促進人文和社會學科中與亞洲文化和社會有關的學術性研究。其中，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特別是中國，是該組織研究的重點。一般說來，這個機構不支援傳統漢學，尤其是古典文學方面的研究課題。例如，他們近些年從事的課題有：亞洲人的自然觀、中國的社會制約體制、民族意識在中國、中國的商務與官僚制度、中國在亞洲崛起中的作用、臨界轉折期的中國文化、中國婦女的消費文化觀等等。這些都反映了此機構的一貫傾向。

挪威現代中國研究轉向的情況，似乎介於瑞典和丹麥之間。在初始階段，挪威與其他北歐國家一樣偏重於傳統漢學，這一傾向以奧斯陸大學的翰漢樂為代表。然而，從 1973 年起，這個大學設立了一個研究中國歷史和地理的教授職位，並由羅特維 (Tryggve Lotveit) 承擔，他的研究重點是 20 世紀中國。¹⁶ 但挪威人對現代中國的語言和文學也顯示出了極大的關注。1979 年，設立了一個研究現代中國語言和文學的教授職位。這個職位首先由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擔任，幾年後，由杜博尼 (Bonnie McDougall) 擔任，1995 年起由哈爾沃·艾夫林 (Halvor Eifring) 擔任。三位學者都對中國文學有一定的研究。

由於負有確定諾貝爾和平獎獲獎人選的責任，並且成立了諾貝爾委員會。在諾貝爾委員會推動下，挪威的中國研究具有了關注中國當代社會和政治的色彩。在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研究方面，挪威比較重要的人物有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¹⁷ 另外，在中國研究方面，還有在奧斯陸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的白肯 (Børge Bakken) 以及勃克曼 (Harald Bøckman) 等人。

芬蘭的現代中國研究出現得較晚，但近年來，已獲得了一些明顯的成就。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考克·賴

15 Kjeld Erik Brødsgaard, "State of the Field: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Scandinavi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6.9: 944.

16 羅特維著有《中國的共產主義，1931-1934：民間政府的經驗》(*Chinese Communism, 1931-34: Experience in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Curzon Press, 1979)。

17 文安立著有 *Cold War &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冷戰和革命：蘇美爭霸和中國內戰的起源，1944-194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提能 (Kauko Laitinen)，一位受過傳統漢學訓練的當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研究者。另外還有一批正在成長的中國商務、外交等方面的研究者。由於芬蘭自身民族歷史的原因，這個國家對中國北方的滿族和蒙古族的研究也特別關注。

五、北歐漢學從古典到現代轉向的意義

北歐漢學的現代轉向，無論從研究內容的變換，還是從研究方法的轉化上看，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 17、18 世紀，法國、德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學者接觸中國文化時，把對遙遠的中國文化的景仰與他們自身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問題結合起來，具有「中為西用」的特點。例如，當時伏爾泰、萊布尼茲、歌德等一些大學者在讚揚中國文化時，常常是針對他們本國思想文化中的一些情況而言的。由於這種原因，最早的漢學，常常有將中國理想化的特點，例如，將中國的科舉制度理解成是柏拉圖式哲學家擔任國家管理者理想的實現。當然，這種對中國的景仰，是對中國現實的瞭解與一些對中國的浪漫化理想結合的產物。

漢學的下一步發展，或者說，嚴格意義上的漢學的產生，是與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語言和實物聯繫在一起的。這就是把現代的研究方法，或者把在對歐洲相應的課題研究中所積累起來的經驗應用到中國課題上去。在這種研究框架之中，中國就不再是一個理想的樂土，而是實際存在著的一個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高本漢的研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高本漢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運用其對歐洲語言的學習和研究中積累起來的經驗，對中國古代語言進行了研究，從而擬定了中國的中古音韻系統。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包括中國人自己在內的古代中國文化研究者的重視和尊重。再比如說，長期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教授的芬蘭人喜仁龍 (Osvald Sirén)，運用西方藝術史的方法研究中國藝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所有這些成果，對於西方人瞭解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澄清前一個時代對中國文化的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有著重要意義。從另外一個方面說，這

種研究對於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也具有重要的意義。許多中國學者正是從西方漢學家那裏受到啓發，而建立了現代中國學術。

然而，他們的這種研究畢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在傳統漢學的框架下，研究課題的範圍比較狹窄，側重於語言學、考古學和中國古代思想和古代文學，而現代中國基本上在他們的視野之外。於是，漢學被理解為類似於古埃及學、兩河流域研究、馬雅文化研究等一類的學問，致力於研究一些燦爛的古代文明。現代中國的存在，中國在現代社會所起的作用，迫使西方社會對之加以關注。然而，由於傳統漢學的慣性發展，這種對現代中國的研究一下子很難從大學的漢學科系中自然發展起來。這時，一些新聞記者、社會科學研究者，左翼知識份子在現代中國的研究中起了推動作用。在這種社會力量的推動下，北歐一些大學的漢學系逐漸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現代中國研究。同時，在漢學系之外，一些其他社會和人文科系的學者也出現了關注中國現代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研究的跡象。

從研究課題上講，除了從對古典文本和器物的研究轉向對現代文本的研究上來以外，這種課題的範圍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北歐的中國研究者們關注的課題從語言、文學和思想領域擴大到了中國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區域研究、婦女問題等眾多領域。研究方法，也從僅僅對器物和文本的關注發展到對中國的實地考察、與當代中國學者交流和對話。對於北歐的漢學家來說，中國不僅僅是一個擁有豐富智慧的圖書館和博物館，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正在發展中的，有著遠大前途，但同時也存在著種種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的國家和民族。

由於這種轉向，北歐的漢學具有了兩個發展趨勢：第一，它從一種現代對古老文明的研究向現代國家之間的相互研究轉化，成為一種在共同文明水準上的民族與國家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影響。第二，漢學的研究走出了漢學系，成為各門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家們共同關注的課題。而所有這些，都是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日益發展，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高聯繫在一起的。